

上海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

汪明峰,程 红,宁越敏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摘要: 基于上海市城中村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维度,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从外来人口的个体因素和流入地因素两方面考察了对社会融合及其主因子的影响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由社会关系融合、经济融合、心理融合和文化融合4个维度构成。从因子得分来看,上海城中村的社会融合程度总体水平并不高;在各个维度上,从社会关系、心理、文化到经济的融合程度依次降低。总体而言,流入地因素对于城中村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要大于个体层面因素。其中,个体层次因素对心理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最大,而流入地因素则对经济融合因子和社会关系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都较大。研究还表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与其居住社会空间紧密相关。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关键词: 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城中村;影响因素;上海

DOI: 10.11821/dlxb201508005

1 引言

中国城市外来人口规模庞大,且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举家迁入城市,在城市中居住的时间趋长。据“六普”统计,2010年底全国流动人口达2.42亿人,其中约1.5亿人是乡—城迁移人口。根据现行的城市人口统计方法,乡—城迁移人口是中国新增城市人口的主力军,属于统计意义上的城市人口。然而长久以来中国城乡分治,导致外来人口游离于城市系统之外,使该群体难以像普通市民一样享受城市社会保障与社会服务^[1-2],并在流入城市中遇到种种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排斥^[3-4]。因此,在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如何促进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已开展较多的研究。地理学对外来人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来人口乡—城流动原因、过程、机制以及空间分布研究^[5-10],而对该群体进入城市后如何融入城市社会的研究还不多。但最近两年,地理学者也开始以特有的空间视角涉足这一热点研究领域^[11-14]。

由于研究视角存在差异,已有文献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认识不尽相同^[15],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可供准确比较的测量指标体系^[16]。不过,学者们普遍认同社会

收稿日期: 2014-06-30; 修订日期: 2015-02-18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1JZD02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2900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840015) [Foundation: Key Projec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Ministry of Education, No.11JZD028;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329001; Key Project of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t Universiti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No.11JJD840015]

作者简介: 汪明峰(1977-), 男, 浙江绍兴人, 副研究员,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7100M), 主要从事城市地理与区域规划研究。E-mail: mfwang@re.ecnu.edu.cn

融合具有多维度特征^[17],但对于各维度的方向性以及维度之间的关系则存在争议。国内大部分学者或借鉴国外理论体系^[18]或根据已有数据主观上选取社会融合的测量维度^[19-20],从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进行了探讨^[21]。关于移民的社会融合影响因素分析,国外较多针对的是少数族裔和难民^[22-25]。除了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等因素,流入地的国家政策、种族信仰、主流社会成员态度、语言等因素对移民社会融合都有作用^[26]。在国内,多数学者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普遍较低^[19, 27],究其原因与制度、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不足、本地人的排斥等有关^[20, 28-30]。此外,年龄、性别、婚姻状况^[31]、方言掌握程度^[12, 32]等个体因素也对其社会融合状况产生影响。综合上述文献来看,绝大部分的社会融合研究针对外来人口或流动人口的整体展开分析。但已有学者指出流动人口中不同群体在城市中的需求和对生活的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差异^[33-34]。

事实上,有关移民的社会空间研究是城市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29]。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差异性不仅仅表现在社会群体之间,也存在于空间维度上。不同城市^[12]、城市内部不同区域^[13, 35],以及社区内部^[11],都会存在社会融合水平的差异。但已有的地理学文献对其背后的形成机制缺乏系统性、针对性的分析。由于大部分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交范围和活动空间普遍较小,他们所居住的社区或周遭环境对于这一群体融入城市至关重要^[11, 36]。因此,针对特定聚居区的外来人口展开调查,分析其居住条件和社区融合状况,可以更为准确地反映其中的问题。而且,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众多,机制复杂,有必要对这些因素进行区分,并通过计量方法展开细致的分析。在空间维度上,对外来人口流入地的因素进行探讨显得尤为重要。所以,需要有更多实证性的调查研究,来从地理学的视角更全面系统的理解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这一关键环节。

本研究针对上海市的城中村外来人口展开调查,从城市化微观行为主体的视角考察城中村中的社会融合状况;并从个体和流入地两个方面分析社会融合背后的影响因素,力求对大城市外来人口市民化机制有更深入细致的了解;在分析和讨论过程中,注重将上海案例与其他城市的情况进行区域比较,总结城市之间的异同及其成因;最后提出政策启示,以期当前城市建设和社会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2 研究设计与分析方法

2.1 问卷调查方案

研究数据来源于2010年底和2011年初开展的上海市城中村住户抽样调查。由于当时城中村研究开展时间不长,但研究视角众多,还未形成统一的严格定义。本调查对城中村的界定主要基于空间视角,即城中村在空间位置上处于城市发展用地范围内,仍然存在一部分村建设用地,被城市用地所包围或与城市用地互相交错^[37-38]。根据这一标准,在调查初期通过咨询有关政府机构和实地查访,掌握了上海市中心城区现存的绝大多数城中村的基本情况,并建立了城中村的名录。然后,在名录中根据各区分布的城中村数量同比例抽样,最终确定23个城中村作为调研目标^①。

根据各城中村的规模大小,问卷发放数量有所区别。其中,20个一般村分别定额发放20份问卷,3个重点村分别定额发放100份。从个别样本村来看,问卷覆盖率偏低,

① 鉴于城市村的规模差异较大,本调查将城中村分为两类。其中,规模较小的一般村有20个,包括:普陀区的小俞家弄、后陆宅、李家宅、费家宅、居家宅;徐汇区的东湾村、夏泰浜、吴家宅、长桥南街、徐家桥;闸北区的西钱塘村;闵行区的王前村、虹二村、行南村、朱行村、友谊村、沪星村;浦东新区的八一村、新东街、李家宅。规模较大的重点村有3个,包括:徐汇区的高家浜、普陀区的老真北地块、闵行区的九星村。

但从全市尺度来看,通过各村样本叠加反映全市特征,其抽样方法是可取的。调查过程中,在每个城中村根据家庭地址使用等距抽样方法(每隔5户抽取1户)选择住户,旨在操作层面确保抽样的随机性。问卷调查采用面对面访谈方式进行,调查对象为户主,问卷涉及户主及其家庭住户成员的基本情况、家庭收支状况、居住状况,以及户主就业状况等信息。最终,共计回收700份家庭问卷,其中包括外来人口家庭600份。剔除相关信息空缺的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475份,有效率约为79%。此外,本研究中采用的相关对比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和《上海统计年鉴2011》。

2.2 社会融合的测量方法

本文从城市化的角度,界定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概念,即指在城市社会中,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在各方面差异性的消减过程。城中村的外来人口正处于常住化向市民化阶段转变的过程中^[39],但社会融合程度如何,需要首先解析各维度上的融合状况。

借鉴国内外学者对移民社会融合的研究基础,本研究共设计了11项指标。根据田凯^[40]的“再社会化说”,选取了收入高低程度、职业稳定程度和职业阶层三个经济层面的指标。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必须具备相对稳定的职业、足够的经济收入及一定的社会地位^[40]。鉴于不少学者强调社会网络和社区中社会关系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性^[30],选取了社区交友范围、社区成员友好度、邻里支持程度、社区成员观念和习惯相似度来衡量外来人口在社会层面的融合。当前外来人口成为常驻“外来人口”或候鸟式“迁徙人”的主要原因是对流入地没有归属感^[17]。这种身份认同的问题主要来源于国家或城市政府的制度安排和社会建构^[3]。但对于个体而言,唯有真心愿意留在城市打拼和长期生活,外来人口才有可能真正融合到城市生活中^[27]。因此,将社区成员身份认同程度、社区长久居住意愿度也作为衡量社会融合的指标。此外,有学者认为流动经历和城市生活经验对一个普通农民完成其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具有重要作用^[41]。长期居住在城市,必然受到城市文化影响,而城市文化包括了现代工业文明和区域文化^[30]。根据多元文化论的观点,只考虑外来人口接受现代工业文明的情况,选取互联网使用状况和法律意识来衡量。汪明峰^[42]指出互联网使用技能的城市化属性,因此,本文尝试从互联网使用方面来窥视该群体的现代化技能提高程度。此外,来沪外来人口进入上海最需解决的就是住的问题,房租廉价、交通方便的城中村是他们的重要选项之一^[2],但租房过程中常常遇到房东乱涨价的情况,因此签订租房合约可看作是外来人口法律意识提高的表现^[43]。

上述指标的具体操作化定义如下:

收入高低程度(X_1)。城市外来人口经济融合的目标是提高该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减少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因此,将城中村外来人口的人均收入高低程度分为4组:若是低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赋值为1;若是介于全国农村居民均纯收入和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为2;若是高于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但低于上海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若是高于上海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则为4。

职业稳定程度(X_2)。用签订的就业合同类型反映外来人口的职业稳定程度,并将职业稳定程度分为4类:拥有固定工作和长期合同的赋值为4,中短期合同的为3,不适用的(私人业主或个体户)赋值为2,临时工和不工作的为1。

职业阶层(X_3)。职业阶层可以反映外来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将从事非体力劳动的赋值为3,具体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自我雇佣的商贩类型赋值为2;体力劳动的为1。

社区交友范围(X_4)。通过问卷中“我认识社区的很多人”和“多数邻居都认识我”两个题项来测量。同意程度的赋值分别为“5绝对同意、4比较同意、3一般、2比较不同

意、1 绝对不同意”。社区交友范围为两个题项的得分之和。

社区成员友好度 (X_5)、邻里支持程度 (X_6)、社区成员观念和习惯相似度 (X_7)、社区成员身份认同程度 (X_8)、社区长久居住意愿度 (X_9) 五个指标都分别采用问题问答形式, 分值也是用“5 绝对同意、4 比较同意、3 一般、2 比较不同意、1 绝对不同意”来测度。互联网使用状况 (X_{10}) 和法律意识 (X_{11}), 则分别通过题项“您的住房是否拥有互联网设施”(1 有互联网设施, 0 无互联网设施) 和“您和房主是否有租房合约”(2 有书面合约, 1 口头合约、0 没有任何合约) 进行测度。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可知(表1), 上海城中村外来人口人均收入的平均水平高于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但低于上海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②, 职业稳定程度的平均水平也达到了签订中短期合同的水平, 但多从事体力劳动。从统计描述来看, 城中村外来人口在城中村与社区其他成员相处相对融洽。由于城中村居住的人口以外来人口为主, 被访问者在社区中接触到的多是自己一样的外来人口, 同质性较强。但是, 调查结果也显示城中村外来人口对自我社区身份的认同和长久居住的意愿评价较低, 且差异较大。在访谈中, 我们也了解到很多城中村传闻将被拆迁, 这可能降低了外来人口长久居住的意愿。互联网使用状况和法律意识的均值较低, 表明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现代化技能和意识均有待提高。调查显示仅有 14.0% 的外来人口家庭使用互联网, 这与上海 2010 年底的家庭宽带入户平均普及率 61.8% 有着很大的差距, 与全国平均水平 38.3% 也存在差距。事实上,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不是第一代移民容易实现的事情^[17]。本调查也发现, 新一代移民的现代性要远高于第一代移民, 年龄越小的外来人口越会接触和使用互联网^[44]。从租房合同来看, 大多数(80.2%) 是口头约定, 说明只有少部分人会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为避免过多的指标, 沿用有关文献的方法对维度结构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归并^[19-20]。将上述 11 个测量指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构建社会融合的主要结构因子, 这几个主要因子代表了原来因子的大部分信息, 同时展示了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结构维度。找出主

表 1 社会融合指标的描述统计
Tab.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dices

指标名称	取值范围	均值	标准差
X_1 收入高低程度	1~4	2.83	1.041
X_2 职业稳定程度	1~4	2.64	1.065
X_3 职业阶层	1~3	1.70	0.917
X_4 社区交友范围	1~10	6.57	1.575
X_5 社区成员友好程度	1~5	3.60	0.580
X_6 邻里支持程度	1~5	3.31	0.731
X_7 社区成员具有相同观念和习惯	1~5	3.24	0.678
X_8 社区成员身份认同程度	1~5	2.55	1.121
X_9 社区长久居住意愿度	1~5	2.79	1.133
X_{10} 互联网使用状况	0~1	0.14	0.344
X_{11} 法律意识	0~2	1.14	0.423

②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1》, 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585 元/月, 农村居民月人均纯收入为 493 元。根据《上海统计年鉴 2011》, 2010 年底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653.2 元/月。本调查中, 城中村外来人口家庭月人均收入为 2087 元, 其中绝大部分家庭的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有 61% 的家庭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有 22% 的家庭人均收入超过了上海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考虑到本调查对城中村家庭人口数的统计仅包含了在本居所居住的人口, 因此其家庭实际收入水平可能低于调查数值。

因子后,以主因子方差贡献率为权数,按标准分转换成1~100分之间的数值,计算综合得分,同时新因子用同样的方法进行转换得出各维度具体分值。因子分析主要表达公式如下:

$$X_i = \mu_i + a_{i1}F_1 + a_{i2}F_2 + a_{i3}F_3 + \cdots + a_{im}F_m + \varepsilon_i \quad (1)$$

式中: X_i 表示原来的指标变量; F_1 、 F_2 、 F_3 、 \cdots 、 F_m ($m < i$)表示不可观测的潜在因子,综合了原来 i 个指标信息; ε_i 表示不被包含的信息部分,作为特殊因子。

2.3 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借鉴前文梳理的移民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从个体和流入地两方面探讨影响上海城中村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其中,个体特征因素包括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培训、年龄、户口性质、在此地的亲人相伴数、在流入地居住时间等八个因素。个体层面因素的相关指标具体操作如下:年龄、亲人相伴数、住沪时间指标均为具体数值;性别、婚姻状况、职业培训、户口性质设为二元变量,分别以女性、未婚、没有职业技能培训经验、外地农村户口为参照组赋值为0,以男性、已婚、有工作培训、外地城镇户口赋值为1;文化程度这一虚拟变量设置成4组,以小学及或未受过教育的为参照组赋值为0,初中赋值为1,高中、中专为2,大专及以上为3。

城市外来人口在流入地容易被排斥在流入地社会保障系统、公共服务范围和社区公共活动之外^[32, 45]。因此,将流入地因素归纳为流入地的社会和制度支持,包括社会保障,流入地政府、媒体、社区成员等对外来人口的支持状况,以及社区公共活动参与。国外学者在研究少数民族的社会融合时,突出了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是影响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46]。因此,本研究增加了家庭经济收入因素以代表流入地所提供的社会经济支持条件。具体指标操作如下:社会保障拥有数是外来人口户主拥有的社会保障种类数(选项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其他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流入地社会支持度采用题项“您遇到住房或社区问题时,通过以下哪些渠道解决”来测量(渠道选项包括老乡和朋友、居委会、村委会、物业管理公司或发展商、业主委员会、相关政府部门、新闻媒体、房东、其他)。外来人口解决住房或社区问题的渠道数越多,说明其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其在流入地获得的社会支持度越高^[47-48]。因此,用渠道数之和来测度流入地的社会支持度。社区活动参与度通过问卷中“我和家人参与本社区的公共活动”题项来测量,同意程度的赋值分别为“5绝对同意、4比较同意、3一般、2比较不同意、1绝对不同意”。家庭月收入则为具体数值。

根据调查显示(表2),475份问卷数据中户主性别大多数是男性,占85.4%;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外来人口的文化程度以初中、高中水平为主,教育程度高的外来人口在城中村居住较少。从职业培训变量看,外来人口中84%的被调查者没有过工作培训经验,说明从事的职业所需技术性不强。从年龄来看,居住在此地外来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6.5,其中最小的为16岁,最大的为64岁。从户口性质看,该群体85.3%为外来农村人口,调查中也发现该群体中的外来城镇户口多为家乡耕地被征而转化来的,而户口对于该群体在城中融合中的作用值得关注。从亲人相伴数看,被调查亲人相伴数(包括被调查者)为2.5,此变量最小者为1,最大值为6。可见,以家庭形式在城中村居住的外来人口占比较高。这些人口在上海的居住时间也已较长,均值为6.01年。从流动地因素来看,该群体获取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度都明显较低,家庭户主的社会保障拥有数均值为1.31,社会支持度的均值仅为1.39。社区活动参与度也较低,均值为2.71。所调查的外来人口家庭月收入取值范围跨度较大,从800元到20000元,均值为4647.24元。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行解释,因变量包括社会融合程度和社会融合各主因

表2 社会融合影响因素变量的描述统计
Tab.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social integration

变量属性	变量名称		取值	样本数或均值
个体因素	性别	女(参照组)	0	69个
		男	1	406个
	婚姻状况	未婚(参照组)	0	63个
		已婚	1	412个
	文化程度	小学或未受过教育(参照组)	0	83个
		初中	1	188个
		高中、中专	2	149个
	大专及以上		3	55个
	职业培训	无职业技能培训经验(参照组)	0	399个
		有工作培训	1	76个
	年龄		16~64	36.50岁
流入地因素	户口性质	外地农村户口(参照组)	0	405个
		外地城镇户口	1	70个
	亲人相伴数		1~6	2.50人
	住沪时间		1~25	6.01年
	社会保障拥有数		0~6	1.31项
	流入地社会支持度		0~9	1.39
	社区活动参与度		1~5	2.71
	家庭月收入		800~20000	4647.24元

子融合度，自变量如表2所示共12个。在进行多元回归前，通过极差标准化对原数据进行处理，将自变量的取值转换到0~1之间，以消除数量级不同带来的影响。

3 分析结果

3.1 融合状况测度

在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社会融合的结构维度之前，首先对前文所述的11项社会融合指标进行皮尔逊（Pearson）相关性分析检测，发现各项指标均显著相关，说明所选指标无需剔除。对11项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KMO（Kaiser Meyer Olkin, KMO）检验值为0.708，巴特利特球度检验（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的近似卡方为1029.98，显著水平为0.00。两项检验均说明以上11项指标适合因子分析模型。

经计算，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结构维度有4个（统计学上一般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作为主成分）。用 F_1 、 F_2 、 F_3 、 F_4 表示主因子，特征值分别为2.646、1.863、1.499、1.069。由于 F_3 、 F_4 的特征值与 F_1 的差距较大，使得因子命名缺乏解释性，文中采用方差极大化方法对因子载荷进行正交化旋转，旋转后的载荷值见表3。由表可知，所有因子的共同度均在0.5以上，其中 X_8 社会成员身份认同程度的共同度最大，说明身份认同因子的作用最稳定； X_{10} 互联网使用状况和 X_{11} 法律意识共同度较小，说明这两个因子作用最游离。4个主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63.75%（大于60%）。由检验结果可知，因子分析方法可以用来构建城中村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维度构成。

将 F_1 、 F_2 、 F_3 和 F_4 4个主因子分别命名为社会关系融合、经济融合、心理融合和文化融合。具体主因子命名的解释如下：

表3 社会融合维度指标的因子载荷
Tab. 3 Rotated factor loading matrix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dices

自变量	F_1	F_2	F_3	F_4	共同度
X_1 收入高低程度	-0.022	0.787	-0.101	0.191	0.666
X_2 职业稳定程度	0.035	0.761	0.007	0.072	0.585
X_3 职业阶层	0.015	0.781	0.116	-0.125	0.639
X_4 社区交友范围	0.729	-0.044	0.293	-0.012	0.619
X_5 社区成员友好程度	0.781	0.031	-0.023	0.030	0.612
X_6 邻里支持程度	0.764	-0.078	0.255	-0.018	0.655
X_7 社区成员具有相同观念和习惯	0.744	0.117	-0.153	-0.062	0.594
X_8 社区成员身份认同程度	0.45	-0.070	0.801	-0.009	0.887
X_9 社区长久居住意愿度	0.253	0.111	0.793	-0.028	0.705
X_{10} 互联网使用状况	0.151	0.122	-0.139	0.693	0.537
X_{11} 法律意识	-0.195	-0.015	0.104	0.725	0.575
特征值	2.662	1.863	1.499	1.069	
方差贡献率(%)	23.62	17.31	13.54	9.28	
累积方差贡献率(%)	23.62	40.93	54.47	63.75	

F_1 社会关系融合因子。“社区交友范围”、“社区成员友好程度”、“邻里支持程度”和“社区成员具有相同观念和习惯”4项指标对 F_1 的因子载荷值最高，分别为0.729、0.781、0.764和0.744。从指标表达的内容看，主要涉及外来人口在社区中的社会人际关系。

F_2 经济融合因子。主要由“收入高低程度”、“职业稳定程度”和“职业阶层”三项组成，载荷值分别为0.787、0.761和0.781。很明显，这三项反映了外来人口的经济地位。

F_3 心理融合因子。主要由“社区成员身份认同程度”和“社区长久居住意愿度”代表，二者的载荷值分别为0.801和0.793。这两项反映了外来人口在心理上对自我身份的看法，以及内心中对城中村作为住所选择的意愿度。

F_4 文化融合因子。“互联网使用状况”和“法律意识”的载荷值分别为0.693和0.725。这两个指标代表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现代化水平高低，说明其受到现代城市生活经验影响的程度，也代表着人的“城市化”程度。

4个主因子中，社会关系融合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最多，为23.62%；其次是经济融合因子，占17.31%；然后是心理融合因子，占13.54%；最后是文化融合因子，占9.28%。

目前对于社会融合程度测量尚没用统一的标准，已有文献中多将融合因子等权重^[45]或因子方差贡献为权重^[19-20]。本研究沿用后者，将社会融合程度以各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按照标准分转换到1~100之间的数值，4项新因子得分也作同样的转换（表4）。结果表明上海市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总体水平并不高。从各个主要维度因子来看，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关系融合程度最高，其次是心理融合程度，而文化融合程度

表4 社会融合及其结构维度因子得分
Tab. 4 Score values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its main structural dimension

	F_1 社会关系融合	F_2 经济融合	F_3 心理融合	F_4 文化融合	社会融合程度
均值	59.54	25.76	53.03	32.74	45.51
标准差	16.84	16.00	19.27	16.89	16.47

和经济融合程度均较低。这说明上海市外来人口在城中村中与其他成员相处的较为融洽；心理方面适应也较快，但存在的差异性最大，说明外来人口内部在心理适应方面存在较大的分异；文化融合程度低于整体的社会融合水平；而经济方面融合程度最低，说明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经济地位较低，具体反应在经济收入、职业稳定性和职业阶层的分布上。但经济融合的差异性是4个维度中最小的，说明外来人口经济方面产生的分异性相比其他维度的差异要小。

3.2 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分析影响外来人口社会融合因素中的主导因素，将个体因素和流入地因素中包含的12个变量全部进入回归方程，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来避免共线性问题，最终得到五个回归方程（表5）。结果发现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过程中，流入地因素的影响作用要大于个体因素。对社会融合总体程度起作用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为：家庭收入、社区活动参与度、户口性质、文化程度、亲人相伴数、社会保障拥有数、住沪时间和年龄等八个因素，其因素解释力度为59.2%，显著水平为 $p < 0.001$ 。而性别、婚姻状况、职业培训和流入地社会支持度这4个变量则被剔除。下文将具体分析各影响因素的作用。

在流入地因素中，家庭收入对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总体影响最大。其中，对被调查群体的经济融合和文化融合产生正面影响，且相关性较强（ $p < 0.001$ ），回归系数分别为0.49、0.24。这一结果说明外来人口家庭收入的高低明显影响到外来人口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社区融合。但是，家庭收入变量对社会关系融合和心理融合具有负向作用，回归系数分别为-0.13和-0.07。经济收入较高的外来人口比低收入群体在城中村中感应到的社会关系融洽度要低，对城中村的认同度也较低。

社区活动参与度主要对社会关系融合起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回归系数为0.42， $p < 0.001$ ），在影响社会关系融合的所有因子中排在首位。根据调查，城中村中的外来人口社区活动参与度普遍不高，但参加社区公共活动明显有助于外来人口在社区中建立社

表5 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
Tab. 5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social integration

自变量		社会关系 融合因子	经济融合 因子	心理融合 因子	文化融合 因子	社会融合 程度
个 体 因 素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初中	0.12**		0.06*		0.15**
	#高中、中专	0.20**			0.10**	0.24***
	#大专及以上	0.24**	0.17***		0.15**	0.28***
	年龄	0.14*			-0.12**	0.09*
	户口性质(农村)		0.10*	-0.77***		-0.37**
	亲人相伴数		0.32***	0.08*		0.20***
	住沪时间	0.09*		0.16**		0.10*
流 入 地 因 素	社会保障拥有数		0.22*			0.19*
	社区活动参与度	0.42***		0.15*		0.39**
	家庭收入	-0.13*	0.49***	-0.07**	0.24***	0.40***
常数项		30.17	1.97	51.41	42.64	21.60
F检验值		156.66**	268.79***	233.50**	27.85*	262.12***
调整后的R ²		0.471	0.629	0.662	0.080	0.592

注：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括号内分别为参照组。

会关系,获取社会资本,被居住地居民和制度所接纳。同时,社区活动参与度对心理融合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15 ($p < 0.05$),说明参与社区活动也有利于外来人口自身对居住地的认同度。

在个体因素中,户口性质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总体程度影响最大。其中,对外来人口的心理融合起到显著的负向作用,但对其经济融合的促进具有一定相关性(回归系数分别为-0.77、0.1,相关显著性分别为 $p < 0.001$ 、 $p < 0.05$)。这一结果说明外来城镇人口相对于外来农村人口在经济适应上有一定的优势,但并不是特别显著。然而,户口性质严重影响着外来人口对城中村村的看法或认同度,外来城镇户口的人对城中村的认同度往往较低。

文化程度对被调查者的社会关系、经济和文化融合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心理融合的影响很小。根据回归结果,可知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外来人口在居住社区中的交往,也越有利于融入城市的现代化文化生活之中。在经济融合方面,只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外来人口才比参照组在经济适应上较有优势,说明外来人口在上海的经济适应门槛较高。而在心理融合方面,较高学历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作用并不显著,只有初中学历的外来人口比参照组更容易认同城中村(显著水平 $p < 0.05$)。

亲人相伴数主要对经济融合起到显著作用。根据调查,城中村外来人口家庭人口数均值为2.5,单身的并不多(约一成),夫妻双方在上海一起奋斗占八成以上,一家三口在城中村居住的近三成,家庭有四人及以上在城中村居住的约两成。亲人相伴数越多,家庭经济收入越高,并可节约生活成本。此外,家庭成员同住一地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外来人口的心理融合。

除上述因素之外,社会保障拥有数、住沪时间、年龄这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其中,社会保障拥有数主要对经济融合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住沪时间主要对外来人口的心理融合和社会关系融合起到正向作用(回归系数分别为0.16和0.09,相关显著性分别为 $p < 0.01$ 和 $p < 0.05$)。住沪时间越长越有利于外来人口在社会关系方面的融合,同时也有利于外来人口对居住地的认同度。年龄对社会关系融合起着正向促进作用但对文化融合起负向作用,说明年纪大的外来人口在居住社区社会关系越融洽,反过来,年纪轻的外来人口在文化方面则更容易适应城市生活。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上海市城中村居民的实地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首先,研究发现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由社会关系融合、经济融合、心理融合、文化融合4个因子构成。其中,社会关系融合因子主要反映城市外来人口在居住区内与其他成员的社会关系状况;经济融合因子反映该群体在城市居住的经济地位状况;心理融合因子反映该群体对城中村长久居住的意愿度和自身成员身份的认同程度;文化融合因子则是反映该群体在城市中居住的现代化程度高低。其次,根据因子得分来看,城中村的社会融合程度总体水平并不高,半数以上的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状况欠佳,只有少数部分人融入了当地社区。从各主因子看,城市外来人口从社会关系融合、心理融合、文化融合到经济融合的程度依次降低。第三,总体而言,在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过程中,流入地因素的影响作用要大于个体层面因素。其中,个体层次因素对心理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最大,而流入地因素则对经济融合因子和社会关系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都较大。因此,影响社会融合的因素众多,在不同维度上的作用也各

不相同。

与其他学科强调社会群体差异不同, 地理学更关心现象背后的空间差异和机制^[13]。已有研究表明, 流动人口在不同城市的融入程度差别很大, 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层面也存在差异^[12]。本研究分析结果与其他城市比较, 差异也很明显, 比如较多的文献认为社会融合中的经济层面相对是最好的^[12, 45], 但在本研究中恰恰是最低的, 反而社会关系的融合度是最高的。这一差异可能是由于城市特性即流入地因素的影响, 但也可能是因为调查对象的差异。已有的研究都未限定明确的居住空间类型, 而本研究针对城中村这一独特的居住空间。调查发现, 城中村的生活空间满足了低收入外来人口的居住需求, 也为其融入城市社区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支撑。因此, 社会关系融合维度的得分最高, 大部分外来人口与社区其他成员相处相对融洽。由于城中村的住户多数是低收入群体, 社区成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这使得外来人口互相帮助, 彼此友好度也较高, 也容易形成共同的观念和习惯, 从而有利于外来人口在心理上建立社区认同感。但对于高收入或外来城镇人口而言, 情况则正好相反, 他们在城中村中居住反而不利于融入社区。此外, 本研究的结论还与部分研究假设不符, 如职业培训对社会融合并没有起到显著的影响作用, 这可能与城中村外来人口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有关。访谈中, 我们了解到大部分外来人口从事的多为体力劳动工作, 并不需要较高的技能, 因此接受培训的人很少。因此, 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明显受到流入地尤其是其居住社区的影响, 这也正是本研究的主要出发点, 需要更多有针对性的调查, 进一步了解在城市内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以及不同社会空间之间社会融合的差异性, 以期更全面、深入的把握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空间变化。

最后, 提供一些政策启示。① 除了提高经济收入之外, 流入地在制度设计方面向外来人口更加开放, 提供属地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和保障, 是促进外来人口经济融合的重要路径。从经济融合因子看, 大部分外来人口职业已相对稳定, 经济状况跟农村比有所改善, 但大部分人的收入水平与上海市城市居民还存在较大差距, 且多数是以牺牲生活质量为代价, 职业层次上多为体力劳动者。因此, 在社会融合的4个维度中, 经济融合的得分仍然最低。进一步, 流入地提供的社会保障将促进该群体的经济融合, 特别是已长期在上海居住的举家迁移的外来人口。② 提升教育文化素质仍然是促进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重要基础。在文化融合维度上, 本文发现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现代化意识和现代化技能与城镇居民仍有相当大的差距。特别是在当前快速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背景下, 生活方式的转变是适应城市生活的主要方面之一。在本研究中, 也发现年龄是外来人口现代化技能普及的一个限制因素, 因此, 关注二代移民的现代化技能普及和使用具有重要意义。二代移民的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提高, 将为其家庭更快的融入城市社区的现代化生活提供可能。③ 合适的居住空间是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重要支撑。因此, 城市在接纳外来人口之时, 也要人性化对待, 创造多样化的居住空间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特别对于低收入人群而言, 当前许多城市大规模拆迁城中村的运动, 并不一定有助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和快速城市化进程。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Li Peilin, Li Wei.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nd social attitudes of migrant workers in recent year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0(1): 119-131. [李培林, 李伟. 近年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 *中国社会科学*, 2010(1): 119-131.]
- [2] Wang Mingfeng, Lin Xiaoling, Ning Yuemin. Migrant populations, temporary residence, and urban village renovation: A survey of migrant settlements in Shanghai.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2, 36(7): 73-80. [汪明峰, 林小玲, 宁越敏. 外来人口, 临时居所与城中村改造: 来自上海的调查报告. *城市规划*, 2012, 36(7): 73-80.]

- [3] Chen Yingfang. "Migrant worker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nd identity. *Sociological Research*, 2005(3): 119-132. [陈映芳. “农民工”: 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 *社会学研究*, 2005(3): 119-132.]
- [4] Gu Haiying, Shi Qinghua, Cheng Ying, et al. The system and policy of alleviates "the new dual structure" problem at present stage: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migrant workers in Shanghai. *Management World*, 2011(11): 55-65. [顾海英, 史清华, 程英, 等. 现阶段“新二元结构”问题缓解的制度与政策: 基于上海外来农民工的调研. *管理世界*, 2011(11): 55-65.]
- [5] Feng Jian, Zhou Yixing, Cheng Maoji. The study o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Nanjing.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1, 25(1): 16-22. [冯健, 周一星, 程茂吉. 南京市流动人口研究. *城市规划*, 2001, 25(1): 16-22.]
- [6] Gu Chaolin, Cai Jianming, Zhang Wei, et al. A study on the patterns of migration in Chinese large and medium citi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99, 54(3): 204-212. [顾朝林, 蔡建明, 张伟, 等. 中国大中城市流动人口迁移规律研究. *地理学报*, 1999, 54(3): 204-212.]
- [7] Lu Qi, Wu Peilin, Lu Lixin, et al.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grants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eijing 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ir distribu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5, 60(5): 851-862. [鲁奇, 吴佩林, 鲁礼新, 等. 北京流动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区域差异. *地理学报*, 2005, 60(5): 851-862.]
- [8] Tian Jianping, Xu Xueqiang, Zhao Xiaobin, et al. Non-native born low-income migrants settlement and below-up urban development.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2, 22(4): 476-482. [田剑平, 许学强, 赵晓斌, 等. 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安置与自下而上城市化发展. *地理科学*, 2002, 22(4): 476-482.]
- [9] Yuan Yuan, Xu Xueqiang, Xue Desheng. Spatial distribution, evolution and driving force of non-registered population of Guangzhou metropolitan area in 1990-2000. *Economic Geography*, 2007, 27(2): 250-255. [袁媛, 许学强, 薛德升. 广州市1990-2000年外来人口空间分布、演变和影响因素研究. *经济地理*, 2007, 27(2): 250-255.]
- [10] Wu F, Zhang F, Webster C.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Enclaves and Transient Urbanism*. London: Routledge, 2014.
- [11] Liu Wangbao, Xie Lijuan, Zhang Zhengsheng. Urban village leisure space and community integration between local and migrant population: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Shipai Village.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3, 22(3): 83-91. [刘望保, 谢丽娟, 张争胜. 城中村休闲空间建设与本、外地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 以广州市石牌村为例. *世界地理研究*, 2013, 22(3): 83-91.]
- [12] Tian Ming, Bo Junli.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igrant urban integration wit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Human Geography*, 2014, 29(1): 43-48. [田明, 薄俊丽. 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比较研究. *人文地理*, 2014, 29(1): 43-48.]
- [13] Yu Yunjiang, Sun Bindong, Sun Xu. The level of urban social integration based on ESDA: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Human Geography*, 2014, 29(2): 123-128. [余运江, 孙斌栋, 孙旭. 基于ESDA的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水平空间差异研究: 以上海为例. *人文地理*, 2014, 29(2): 123-128.]
- [14] Zhu Yu, Lin Liyue. Mobility pattern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social protection: Moving from 'urban inclusion' to 'social inclusio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31(3): 264-271. [朱宇, 林李月. 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与社会保护: 从“城市融入”到“社会融入”. *地理科学*, 2011, 31(3): 264-271.]
- [15] Wu Fulong, Li Zhigang. Social integration in transitional urban China. *China Urban Studies*, 2013, 6: 27-38. [吴缚龙, 李志刚. 转型中国城市中的社会融合问题. *中国城市研究*, 2013, 6: 27-38.]
- [16] Ren Yuan, Qiao Nan. Social integration for migrant: Process, measurement and determinants. *Population Research*, 2010, 34(2): 11-20. [任远, 乔楠. 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 *人口研究*, 2010, 34(2): 11-20.]
- [17] Yang Juhua. From the segregation, selection to the assimila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immigrant assimilation. *Population Research*, 2009, 33(1): 17-29. [杨菊华. 从隔离, 选择融入到融合: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 *人口研究*, 2009, 33(1): 17-29.]
- [18] Huang Kuangshi. Social integration indicator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practice in EU and construc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Nanjing College for Population Programme Management*, 2011, 27(1): 26-31. [黄匡时.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指数: 欧盟实践和中国建构.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1, 27(1): 26-31.]
- [19] Zhang Wenhong, Lei Kaichun. The urban new immigrants' social inclusion: Internal structure, pres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Sociological Studies*, 2008(5): 117-141. [张文宏, 雷开春.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社会学研究*, 2008(5): 117-141.]
- [20] Yu Yunjiang, Gao Xiangdong, Guo Qing. Research on social integration for new genera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Based on the survey in Shanghai. *Population & Economics*, 2012(1): 57-64. [余运江, 高向东, 郭庆. 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基于上海的调查分析. *人口与经济*, 2012(1): 57-64.]

- [21] Zhou Hao, Measurement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immigrant assimilation i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2012, 36 (3): 27-33. [周皓.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及理论思考. *人口研究*, 2012, 36(3): 27-33.]
- [22] Portes A. Social capital: The origins and application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8, 24(1): 1-24.
- [23] Portes A, Parer R N, Cobas J A. Assimilation or consciousness: Perceptions of U.S. society among recent Latin American im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Forces*, 1980, 59(1): 200-244.
- [24] Kibreab G. Revisiting the debate on people, place, identity, and displacement. *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1999, 12(4): 384-410.
- [25] Hume S E, Hardwick S W. African, Russian, and Ukrainian refugee resettlement in Portland, Oregon. *Geographical Review*, 2005, 95(2): 189-209.
- [26] Goldlust J, Richmond A H A. Multivariate model of immigrant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74, 8(2): 193-225.
- [27] Shen Qianfan. Study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in Beij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沈千帆. 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28] Xie Guihua. Returns to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2(4): 103-124. [谢桂华. 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与社会融合. *中国社会科学*, 2012(4): 103-124.]
- [29] Li Zhigang, Liu Ye. Beyond spatial segregation: Neo-migrants and their social networks in Chinese citi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6): 785-795. [李志刚, 刘晔. 中国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与空间分异. *地理学报*, 2011, 66(6): 785-795.]
- [30] Yun Zhongshan, Li Shuzhuo, Feldman Marcus. Social Integra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Current Status,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2. [悦中山, 李树茁, 费尔德曼.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研究: 现状、影响因素与后果.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31] Li Shuzhou, Ren Yike, Jin Xiaoyi, et al. A research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Chinese migrant rural worker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social support network. *Population & Economics*, 2008(2): 1-8. [李树茁, 任义科, 靳小怡, 等. 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 *人口与经济*, 2008(2): 1-8.]
- [32] Yang Xusong, Jin Xiaoyi, Xiao Qunying, et al.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olicy study 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integration: A case of Shenzhen. *China Soft Science*, 2006(2): 18-26. [杨绪松, 靳小怡, 肖群鹰, 等. 农民工社会支持与社会融合的现状 & 政策研究: 以深圳市为例. *中国软科学*, 2006(2): 18-26.]
- [33] Guo Xinghua, et al. Drifting and Root-Seeking: The Social Identity of the Migrant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1. [郭星华, 等. 漂泊与寻根: 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研究.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34] Zhao Xiangguang, Li Zhigang. Study on place identity of new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3, 37 (12): 22-37. [赵向光, 李志刚. 中国大城市新移民的地方认同与融入. *城市规划*, 2013, 37(12): 22-37.]
- [35] Lu Renchao, Wang De. A study on the difference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different floating population aggregation types in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9(6): 92-99. [罗仁朝, 王德. 上海市流动人口不同聚居形态及其社会融合差异研究. *城市规划学刊*, 2009(6): 92-99.]
- [36] Li Z, Wu F.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in China's informal settlements: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Urban Geography*, 2013, 34(7): 923-949.
- [37] Wei Lihua, Yan Xiaopei.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urban villages-informal migrant settlements in the developed urban areas of China: A case of Pearl River Delta. *Management World*, 2005(8): 48-57. [魏立华, 阎小培. 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非正式移民聚居区: “城中村”的形成与演进: 以珠江三角洲诸城市为例. *管理世界*, 2005(8): 48-57.]
- [38] Xu Xueqiang, Zhou Yixing, Ning Yuemin. *Urban Geography*.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1997: 291-292. [许学强, 周一星, 宁越敏. *城市地理学*.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291-292.]
- [39] Wang Guixin, Zhang Dezhi. Research on the surviv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inclusion of the immigrants in Shanghai. *Market & Demographic Analysis*, 2006, 12(5): 1-12. [王桂新, 张得志. 上海外来人口生存状态与社会融合研究.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6, 12(5): 1-12.]
- [40] Tian Kai.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urban adapta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995(5): 90-95. [田凯. 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 *社会科学研究*, 1995(5): 90-95.]
- [41] Zhou Xiaohong. The influence of mobility and urban experience on the modernity of Chinese peasants. *Sociological Research*, 1998(5): 58-71. [周晓虹. 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 *社会学研究*, 1998(5): 58-71.]
- [42] Wang Mingfeng. Internet use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A spatial perspective of digital divide. *Sociological*

- Research, 2005(6): 112-135. [汪明峰. 互联网使用与中国城市化: “数字鸿沟”的空间层面. 社会学研究, 2005(6): 112-135.]
- [43] Pan Yuhong, Zhang Xinming, Zhang Dongmei, et al.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housing situation and demand characteristics of young floating populations with high education. *Planners*, 2013, 29(S): 246-249. [潘雨红, 张昕明, 张冬梅, 等. 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居住情况与需求特征研究. 规划师, 2013, 29(S): 246-249.]
- [44] Cheng Hong, Wang Mingfeng. Analysis on factors affecting floating population's using of Internet at home: Insights from a survey of urban villages in Shanghai. *China Urban Studies*, 2012(5): 81-93. [程红, 汪明峰. 上海外来人口家庭上网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城中村”的调查. 中国城市研究, 2012(5): 81-93.]
- [45] Ji Shao. Investigation on the degree of urban integra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data of 500 rural-urban migrant families in Beijing. *Research on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2012(4): 44-49. [纪韶. 农民工融入城市调查研究: 以在北京务工的500个农民工家庭为对象.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2(4): 44-49.]
- [46] Alba R, Nee V. Rethinking assimilation theory for a new era of im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7, 31(4): 826-874.
- [47] Liu Yuqi, Liu Ye, Li Zhigang.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new migrants in China's large cities: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7): 780-787. [刘于琪, 刘晔, 李志刚.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 地理科学, 2014, 34(7): 780-787.]
- [48] Xiao Suowei, Gao Ying. Sources of local support for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survey research in 4 Chinese cities.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3(5): 115-123. [肖索未, 高颖. 外来务工者在流入地的社会支持研究: 基于东部四城市的实证调查.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5): 115-123.]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in Shanghai's urban villages

WANG Mingfeng, CHENG Hong, NING Yuemin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Through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and factor analysi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status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in Shanghai's urban villag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can be mapped on four dimensions: social relation integration, economic integration,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According to the factor scores, the overall level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is not so high,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the lowest one.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 that, on the whole, the inflow factors of migrants exert more influence on social integration in urban villages than the individual factors. The individual factors play the most important roles in determining the status of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while the inflow factors are more helpful to explain the variation in both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social relation integration. The study also shows that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living space. Finally, some policies are suggested.

Keywords: rural 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urban villages; influencing factors